

第四章

旅居東京



革命哲人 章太炎傳



出獄東渡

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獄中坐了三年牢的章太炎終於要出獄了。這天一大早，蔡元培、章士釗、于右任、朱少屏、柳亞子、劉道一、張默君、葉瀚、蔣竹莊、熊克武、劉光漢等人，和同盟會總部從東京派來上海迎接章太炎的代表龔練百、仇式匡、胡國梁、鄧家彥等人，分乘數輛馬車，來到四馬路工部局巡捕房門前迎接章太炎出獄。章太炎要出獄的消息也讓那些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普通百姓紛紛前往巡捕房門前，人們都爭先恐後想一睹章太炎這個反清志士的風采。一時間，巡捕房門口熱鬧非凡。蔣維喬對當時章太炎出獄的情景曾有回憶：「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監禁期滿，將於是日出獄。事前數日，會中先行預備，購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丸民、葉浩吾及余等在滬會員十餘人，均集於河南路工部局門前守候。十時，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馬車，先至中國公學。」¹

在中國公學，章太炎再次受到熱烈的歡迎，香港、北京、湖南、江西、新加坡、日本等地都發來了賀電，祝賀他出獄，並表達對章太炎出獄後的希望。同盟會總部的代表也轉述了孫中山的祝賀，以及邀請他加入同盟會和主持《民報》的期盼。章太炎當場答覆說：「孫逸仙與吾輩同氣，允宜合作。入同盟會與否，俟抵東京定奪可也。至於主撰《民報》，亦俟他日斟酌，何如？」²

由於租界當局在審判時有明確規定，章太炎出來後的停留時間不得超過三天，當晚，章太炎就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〇九頁。

2 鄭家彥：《章炳麟出獄東渡》，臺北《中央日報》一九五三年十月時十五日，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二一一頁。

在同盟會總部代表的陪同下，登上日本客輪，去往東京。第三天，章太炎出現在日本東京，在同盟會總部外的街道上，接受孫中山及一大批留日學生的歡迎。

這是章太炎第三次前往日本，和前兩次情況自然大不一樣，這一次，他是作為當下一個備受矚目的公眾人物，一個革命運動中新起的偶像被歡迎、被接納的。「蘇報案」的影響力十分深遠，章太炎和鄒容作為此案的主角，他們所進行的種種鬥爭，都不僅事關他們的個人命運，而且已經成為當時反清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他們理所應當地就是這一運動的英雄。

到達東京不久，同盟會總部即主持召開了極為隆重的歡迎會，那一天（一九〇六年七月十五日），下起了大雨，而在東京神田町錦輝館，均有二千多人擠滿了會場，大家站在雨中，有的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這位傳奇人物的風采，並傾聽他的演說。

章太炎有生以來還沒有當著這麼多人演講過，但是他並不緊張，他彷彿天生就是一個演講家，兩眼炯炯有神，侃侃而談，許多話是他在牢中早就深思熟慮的，此時也就如汨汨流水一般傾瀉出來，一講就是幾小時。這個演說後來整理出來，洋洋灑灑六七千字，是一篇著名的戰鬥的檄文，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獻。

章太炎從自己早年的思想講起，他首先說道：

兄弟少小的時候，因讀蔣氏《東華錄》，其中有戴名世、曾靜、查嗣庭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發憤，覺得異種亂華，是我們心裡第一恨事。後來讀鄭所南、王船山兩先生的書，全是那些保衛漢種的話，民族思想漸漸發達。但兩先生的話，卻沒有甚麼學理。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

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當時對著朋友，說這逐漸獨立的話，總是搖頭，也有說是瘋顛的，也有說是叛逆的，也有說是自取殺身之禍的。但兄弟是憑他說個瘋顛，我還守我瘋顛的念頭。壬寅春天，來到日本，見著中山，那時留學諸公，在中山那邊往來，可稱志同道合的，不過一二個人，其餘偶然來往的，總是覺得中山奇怪，要來看看古董，並沒有熱心救漢的心思。暗想我這瘋顛的希望，畢竟是難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個和尚，不與那學界政界的人再通問訊。不料監禁三年以後，再到此地，留學生中助我張目的人，較從前增加百倍，才曉得中山先生的本領，嘆人心進化，是實有的。以前排滿復漢的心腸，也是人人都有，不過潛在胸中，到今日才得發現。¹

接下去他就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是關於所謂「瘋顛」的：

只是兄弟今日還有一件要說的事，大概為人在世，被他人說個瘋顛，斷然不肯承認，除那笑傲山水詩豪畫伯的一流人，又作別論，其餘總是一樣。獨有兄弟卻承認我是瘋顛，我是有神經病，而且聽見說我瘋顛，說我神經病的話，倒反格外高興。為甚麼緣故呢？大凡非常奇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而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

1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二六九、二七〇頁。

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現面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의 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兄弟嘗毒劑，是最多的。算來自戊戌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但兄弟在這艱難困苦的盤渦裡頭，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懊悔，憑你甚麼毒劑，這神經病總治不好。¹

在演詩鞏，章太炎還獨出心裁地列舉了古今中外六個他認為是神經病而成大業的人：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
法國思想家盧梭，
回教鼻祖穆罕默德，
德國首相俾斯麥，
明朝名將熊廷弼，
清代督撫左宗棠。

1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二七〇—二七一頁。

面對佇立雨中毫無倦容的聽眾，他不由不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提出他的建議：「有兩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¹

在章太炎看來，用來發起信心，增進國民道德的宗教是佛教，「有的說佛教看一切眾生，皆是平等，就不應生民族思想，也不應說民族思想。殊不曉得佛教是重平等，所以妨礙平等的東西，必去除去。滿洲政府待我漢人種種不平，豈不應該攘逐？」至於他提倡的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跡」。²章太炎的演講征服了在場的聽眾，人們的掌聲經久不息。

這篇洋洋灑灑長達六千多字的演說辭，是章太炎自「蘇報案」以來第一次系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演說的宗旨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即：勇敢，愛國。「神經病」之說，宗教之倡，都是為了提倡勇敢精神，提倡國粹，是為了激發愛國的熱情。而所有的目的，就是為了當時的反清革命。

這篇演說辭更是一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瘋話」自白。章太炎也由此得了個「章瘋子」的雅號。

七月二十五日，《民報》第六期全文刊登了章太炎的這篇演說辭，再次受到了人們的熱烈評議，有人說這是一篇最精闢、最有價值的救國演說。為此，章太炎還專門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自己「感

1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二七二、二七五、二七六頁。

2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二七二、二七五、二七六頁。

愧無量，惟有失信矢忠，竭力致死，以塞諸君之望」¹。

章太炎這次到日本，住在一個叫孫毓筠的朋友家裡。後經孫毓筠的介紹，並由孫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當時，他就表示：「民族主義的學理，諸君今日已有餘裕了。至於發表論說，出版刊物的事，我是要為諸君代勞的了。」²除與孫中山多次接觸，探討問題外，章太炎還結識了宋教仁、黃興等同盟會的許多骨幹成員。

此後不久，章太炎就成為《民報》的主編，開始了一段新的戰鬥生涯。

主編《民報》

《民報》是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於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京創刊。《民報》是在革命急劇發展的形勢下、適應鬥爭的實際需要而誕生的。它以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闡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主旨，明確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綱領。它一出版，就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對風行一時、在知識分子中有相當影響的《新民叢報》的改良主張進行了尖銳鬥爭。批駁了改良派的保皇、開明專制、中國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等觀點，傳播了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平均地權和必須進行武裝起義等革命主張，從而成為中國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幟。《民報》的出版，使革命思潮瀰漫全國，在全國人民和海外華僑中擴大了革命影響，大大地推動了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一三。

2 沈延國：《記太炎先生》，第四五、四六頁，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七六頁。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為辛亥革命的勝利進行了必要的思想準備。當時，《民報》除在日本發行外，大部分秘密運銷於中國。創刊號重印六次，累計達六千份。以後各期的最高發行量達一·七萬份。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民報》第六期出版。從這一期開始，直至一九〇八年十月《民報》被日本當局封禁為止，除去其中的三期，章太炎一直主持《民報》的編輯和發行工作。主編《民報》，可以說是章太炎一生中非常輝煌的一個時期，有了這樣一個平臺，他可以盡情抒發胸臆。據統計，到《民報》終刊，他主編了十六期，發表了八十三篇文章。《民報》所到之處，也就是章太炎的文章和思想影響所到之處。魯迅先生曾對當時的情況有生動的回憶：「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¹

章太炎接任《民報》主編的時候，正值革命派與保皇派的論戰進入白熱化的階段。章太炎的加入，壯大了革命派陣營的聲勢。

自從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風潮日甚一日，康、梁等維新變法的主將，此時卻不能與時代俱進，十分懼怕武裝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仍然堅持擁立光緒皇帝實現君主立憲的立場。並利用他們所屬的各種報刊，大肆鼓吹保皇和君主立憲的主張，詆毀革命派進行的民主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

¹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二七頁。

及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康、梁等人的主張進行了堅決的反駁，雙方以《民報》和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為各自的主要陣地，展開了激烈的論戰。《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的論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規模的論戰。

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同盟會在《民報》第三期上發表號外，題名為《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領》，列出了雙方在十二個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其中有：《民報》主共和，《新民叢報》主專制；《民報》望國民以民權立憲，《新民叢報》望政府以開明專制；《民報》以政府惡劣，故望國民之革命，《新民叢報》以國民惡劣，故望政府以專制；《民報》主張政治革命，同時主張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主張政府開明專制，同時主張政治革命；《民報》以為國民革命自顛覆專制而觀，則為政治革命，自驅除異族而觀，則為種族革命，《新民叢報》以為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不能相容；《民報》以為政治革命必須實力，《新民叢報》以為政治革命只須要求；《民報》以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叢報》以為革命反以得專制；《民報》鑑於世界前途，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民叢報》以為社會主義不過煽動乞丐流氓之具等等。革命派和保皇派的二十多種報刊全部都投入了論戰，歸納起來看，論戰的雙方主要是圍繞民族革命問題、民主革命問題、社會民生和土地國有問題、革命是否會引起內亂和帝國主義的干涉問題展開，實質上是一場要不要實行三民主義，能不能實行三民主義的理論之爭。

章太炎主編《民報》時，正值論戰激戰正酣之際，他認為此前《民報》的主要撰稿人胡漢民、汪精衛等人批駁梁啟超的文章「辭近詬誶」，不利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因此，他「持論平允，讀者

益為嘆服，而又注意於道德節義」¹。本來批判改良派對於章太炎來說就是一件駕輕就熟的事。從當年的《正仇滿論》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章太炎當然地站在了論戰的前方，同時作為主編還要有效地組織文章。論戰中，章太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討滿洲檄》、《定復仇之是非》、《排滿平議》、《中華民國解》等，對改良主義進行了一針見血的批判。

在《討滿洲檄》中，章太炎說：「自盟以後，當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四萬萬人共擊之」；「唯革命之不可以已，而不可以有二也」。《定復仇之是非》說：「夫排滿即排強種矣，排清即排王權矣」，作為漢人，「余豈敢逆其顏行？有伏就斧質而已矣」。《排滿平議》說：「排滿，是指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對於為清政府效命的漢人「亦排之與滿人等」。《中華民國解》說：「已不事生產，而評他人之生產，已不拿租稅，而議他人之租稅，於權利則不當有，於事實則無所知」，並首次提出了「中華民國」的名稱。

章太炎的文風潑辣犀利，最適合於論戰拼殺。他藉《民報》將「革命」兩字的真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將「民主自由」的前景描繪得五彩斑斕，將梁啟超他們的觀點毫不留情地撕裂剝爛。章太炎號稱瘋子，其咒罵帝王、攻擊專制，批駁「立憲救國」的勇猛與無畏，以「瘋狂」兩字來形容毫不過分。梁啟超及其同門師弟在「章瘋子」的猛烈攻勢下，連連失手，鬥志全無，只氣得呼呼喘氣，毫無辦法。

論戰伊始，梁啟超滿以為他「恒帶感情」的曉暢筆鋒無人能敵，不料《民報》的很多文章也明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二五頁。

白曉暢娓娓動人，並且條理縝密、氣勢磅礴。後來有人就說「民報自先生主筆政後，銷數日廣，日二萬份，後至者猶不能得」，使「向之與《新民叢報》有關係者，莫不倒戈相向」，逼使《新民叢報》不得不於一九〇七年七月停刊。

革命派在論戰中的勝利不僅滅了保皇派的氣焰，而且增強了人民的革命信心，鼓舞了鬥志，增長了革命派的威風。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政府頒布所謂的「預備仿行憲政」的詔書，企圖以此籠絡人心，對抗革命。立憲派似乎看到了救命稻草，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梁啟超等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以配合清政府「預備立憲」。梁啟超等提出實行國會制度，建立責任政府；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權限；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等四大政綱。並創辦機關刊物《政論》，繼續鼓吹君主立憲。章太炎隨即在《民報》發表了《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駁神我憲政說》等一系列時評和文章，揭露改良派高唱立憲的目的是「志在干祿」，反覆論述了在中國無法立憲的原因。

一九〇六年秋、冬之間，章太炎還和孫中山、黃興等共同擬訂了指導各地反清起義的文件《革命方略》，明確提出和闡述了實行武裝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基本方略。文件的主要精神是組織國民軍，推翻清王朝，建立軍政治。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民報》週年紀念會時，章太炎寫下了如下祝詞：

我漢族昆弟所作《民報》，倏載至今，適盈一歲。以皇祖軒轅之靈，洋溢八表，方行無闕。自

茲以後，惟不懈益厲，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饒吹，流大漢之天聲。白日有滅，星球有盡；種族神靈，遠大無極。敢昭告於爾丕顯皇祖軒轅，烈祖金天，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漢、新、魏、晉、宋、齊、梁、陳、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聖帝，相我子孫，宣揚國光，昭徹民聽。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虜酋愛新覺羅氏之命，掃除腥膻，建立民國。家給人壽，四裔來享。嗚呼！發揚蹈厲之音作而民興起，我先皇亦永有依歸！¹

一九〇七年，楊度作《金鐵主義說》一文，在其所編《中國新報》第一年第一號（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起連載，第一號《中國所處之世界》說：「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這種說法當然是為（清朝）君主立憲作合法性論證的，意思是華夷之分不在血統而在文化，這一點現在看來當然很有道理，也很有必要。但是章太炎和孫中山當時都堅持狹隘的排滿主張，所以對楊度的理論就非駁不可，不然「排滿」就師出無名。章氏駁斥楊度有「三惑」：一曰未明於託名標識之事，而強以字義皮傳而言；二曰援引《春秋》以誣史義；三曰棄表譜實錄之書，而以意為衡量。他說，「華是國名，緣於華山。夏是族名，並非邦國之號，所以得稱諸夏」，「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為族，而邦國之義斯在。」

1 許壽裳：《章太炎傳》，第四二、五頁。

建華名以為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此文奠定了「中華民國」這一新生國家的國號。

在主辦《民報》期間，章太炎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在清末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中國要走「君主立憲」的道路，而資產階級革命派大都主張建立以西方代議制為楷模的共和政體。章太炎參加資產階級革命運動以後，也曾經是代議制的倡導者。然而從一九〇七年開始，章太炎對西方代議制產生了懷疑，發表了《政聞社會大會破壞狀》、《與馬良書》、《代議然否論》等文，對代議制做了全面系統的分析，以及澈底的否定。

在資產階級改良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對代議制民主大唱贊歌時，章太炎卻「不合時宜」地提出了反代議制的思想。這並是他故意要特立獨行，而是基於自己對中國國情的認真思考，以及對西方代議制民主弊端的認識得出的結論。他在《代議然否論》一文中對代議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此政體者，謂之共和，實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今代議則反失是，不代議則猶有術以得是，斯掉頭長往矣！」²他對西方代議制的批判是很尖銳的，認為「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這說明他並沒有真正地了解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內涵，失之於片面。章太炎對西方代議制民主認識片面，與其經歷有很大的關係，他在青年時期是研究舊學出身的，後來只去過日本幾次，並沒有去過歐美國家，這與

1 許壽裳：《章太炎傳》，第四二、五頁。

2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四六九、四七〇頁。

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遊歷歐美就有了差距。

章太炎這種對歐美代議制度的懷疑，在他後來所寫的一首詩中，充分反映了出來：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
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
隴首餘餼糧，道路無拾遺。
少壯更百憂，負紼來此畿。
車騎信精妍，朦朧與天齊。
窮兵事北狄，三載燬其師。
將率得通侯，材官眊山雞。
帑藏竟塗地，算賦及孤兒。
天驕豈能久？愁苦來無沂。
偷盜遂轉盛，妃匹如隨麋。
家家懷美疚，駢間生瘍微。
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

3

3 章太炎：《東夷詩》，見武繼山編：《章太炎詩文選譯》，第二六一、二六二。

一九〇七年四月，章太炎還與印度愛國志士鉢邏罕、保什等人，發起了由中國、印度、日本、朝鮮及安南、菲律賓等國人士組成的「亞洲和親會」。章太炎任會長。該組織章程規定：「本會的宗旨是反對帝國主義，為爭取亞洲已經喪失獨立的民族獲得獨立。」章太炎「亞洲和親」的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亞洲文化一體論之上的。他在《民報》第十三期上發表《記印度西婆耆紀念會事》和《送鉢邏罕、保什二君序》，將中國與日本、印度三國比喻為一把扇子，中國是扇骨，印度是扇紙，日本則是繫扇柄的扇繩，以此象徵亞洲三國的友好關係。章太炎大亞洲思想與日本的大亞細亞思想有相通之處，都將西方的侵略視為亞洲最大的危險。然而，章太炎的亞洲主義思想中有革命目的在內，希望藉亞洲（主要是日本）的力量，排滿興漢，復興中華。因此，他在親自起草的亞洲和親會的《約言》中強調：「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余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¹這是在組織上把亞洲各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者結合在一起的最初嘗試。

但是，亞洲和親會沒有一個孫中山系統的人，可以看做是章太炎力圖實現自己獨創一套的革命理論的實踐產品，大有與孫中山一比高低另立山頭的架勢。顯然，亞洲和親會與後來的章孫分裂具有某種關聯，至少是反映了兩人思想的歧異。

從總體來看，在主編《民報》期間，章太炎的文章「辨名分，申正義，使天下易其觀聽，而不惑於保皇、君憲之說」²。因此，他成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的主要發言人。不僅如此，在這一時期，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四三頁。

2 李植：《餘杭章先生事略》，《制言》第二五期，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七九頁。

章太炎發表的文章和演說，及其形成的理論體系，範圍也很廣，涉及到了政治、哲學、法律、道德、歷史、國家制度等諸多領域，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相對完整的思想體系。其文章正如魯迅所說的那樣，「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因而影響巨大。據汪東回憶，「尤其章太炎的文辭淵雅，立論以經史為根據，這樣，就讓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震動」。因此，章太炎的文章在當時起了宣傳革命的喉舌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民報》紛爭

在主編《民報》期間，章太炎與吳稚暉之間的矛盾又爆發了。事情的起因還得從一九〇三年「蘇報案」的起因說起。

「蘇報案」發生前夕，江蘇巡撫委派南京候補道俞明震專程趕到上海協助上海道臺準備捉拿愛國學社和蘇報館的革命分子。但俞明震到上海後，兵馬未動，卻先託關係找到了吳稚暉，在出示了朝廷要將蘇報同仁拿辦正法的諭旨之後，又連說「笑話，笑話」，並說以後可以多聯繫，最後暗示，吳稚暉可以出國避一避，去歐洲、美國均可。對於俞明震的賣好，吳稚暉和蘇報的同仁蔡元培、章士釗、章太炎、鄒容等人，開始是當笑話聽的，由於有租界的庇護，他們根本沒把清政府的威脅當一回事。在此之前，租界當局已經找過他們若干次，並保證說，只要他們不私藏軍火，僅僅是批評清政府，沒有關係。蘇報案發後，章太炎和鄒容進了租界的監獄，雖然在清政府看來是重罪輕判，

1 江東：《辛亥革命前後片斷回憶》，《蘇州文史資料選輯》總第六輯，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七九頁。

但畢竟有人受了懲罰。在《蘇報》同仁大多避開的同時，吳稚暉走得最遠，遠赴英國。案發後，有消息傳出，說是章太炎和鄒容的入獄，是吳稚暉告的密。因此，章太炎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

一九〇七年三月，章太炎在《鄒容傳》中指責吳稚暉向俞明震獻策出賣章、鄒，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會清政府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窮治愛國學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愛眇，招眇往，出總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與余昵，余不忍，願條數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復命制府」。眇即出《革命軍》及《駁康有為》上之曰：「為首逆者，此二人也。」¹

由此挑起兩人的論戰。

不久，吳稚暉在其與李石曾合辦的《新世紀》上對章太炎加以反駁，而章太炎在《民報》上連續發表《復吳敬恒書》、《與吳稚暉談論蘇報案》、《再復吳敬恒書》，使論戰的火藥味愈加強烈。此時，吳在《新世紀》上發表《答章炳麟書》、《再答章炳麟書》，對章也大加攻擊。雙方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間的六篇論戰文章，使此事成為當時令人矚目的文壇公案。

章、吳兩人文筆都流暢，也都以「瘋」著稱於世，因此，對罵也甚是有趣。章太炎在一封信中痛罵吳稚暉：

1 章太炎：《鄒容傳》，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第三五四頁。

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問素心，應亦慚惶無地。計窮詞屈，乃復效訟棍行徑，以為造膝密談，非人所曉，洵洵然馳書詰問。足下雖詰問，僕豈無以答足下哉？……嗚呼！外作疏狂，內貪名勢，始求權籍，終慕虛榮者，非足下乎？康長素得志時，足下在北洋，拜其門下，而稱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敗，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為蔡鈞所引渡，欲詐為自殺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猶欲以殺身成仁欺觀聽眾，非足下之成事乎？從康長素講變法不成，進而講革命。從□□□講革命不成，進而講無政府。所向雖益高，而足下之精神點污，雖鐵水不可浣滌。僕謂足下當曳尾塗中，龜驚同樂，而復竊據虛名，高言改革，懼醜聲之外露，則作無賴口吻以自抵調。引水自照，當亦知面目可羞矣。足下始學批尾家當，中則褒愛對策八面鋒之伎倆，最後效村學究，持至簡至陋之教科書以自豪。……康有為門下之小吏，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不屑為者眾矣，未知足下屑此否也？書此敬問撰社。¹

在另一封信中章太炎繼續痛罵道：「足下本一洋奴資格，迨而執贄康門，特以勢利相緣，……今日言革命，明日言無政府，外嬖大閹，忘其雅素，……善箝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袴，勿令後穿。斯已矣，此亦足下所當自省者也。」²真是罵得痛快！

吳稚暉曾在日本留學，因為清政府駐日監督蔡均不許幾個漢族學生入日本的陸軍學校（成城學

1 章太炎：《與吳稚暉》（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二二〇—二二二頁。

2 章太炎：《與吳稚暉》（一九〇八年七月十日），見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第二二四、二二五頁。

校），吳稚暉等人就到清廷駐日機關處抗議，結果蔡鈞照會日本警察，要將吳稚暉驅逐回國。日本警察押送吳稚暉等人經過日本皇宮的時候，吳稚暉突然跳進皇宮外護城河中，欲自殺，警察急忙撈他起來，發現他懷中有一通遺書，大致意思是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寧死不願為日人和清廷所辱。這是當年留日學生界轟動一時的案子，吳稚暉由此聲名鵲起。章太炎嘲笑吳稚暉，說他「不投大壑而投陽溝」，投到溝裡還「面目上露」，真正是刻薄到家了。可吳稚暉對此倒好像被打中七寸，回想起來乾巴巴幾句，氣勢上也遠不如章氏，幸虧當時打筆墨官司的時候，雙方隔著大洲大洋，不然恐怕動的不止是筆墨了。吳稚暉說：「當然替章炳麟打筆墨官司，他哪裡肯罷休。他隨即神速地，好像脫了褲子似的，連珠地放著，寄到最後一覆。我卻真正只好逼住了理屈詞窮，不再對牛彈琴了。沒有別的法子處這種人，只有得了機會，學章陶嚴，脫下皮鞋，打他十七八個嘴巴。」

章、吳之間的這場筆戰以章太炎的全面勝利而告一段落。

一九〇七年六月，劉師培與張繼在東京發起成立了「社會主義講習會」。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大講特講無政府主義。其實，他們宣傳的無政府主義是混雜的，甚至還包含著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例如，《天義報》曾發表過劉師培《〈共產黨宣言〉序》。不管怎樣，這些宣傳給當時的民主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其消極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但章太炎卻大力支持講習會的活動，這也是後來的《民報》紛爭埋下了伏筆。

劉師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字申叔，號左龕，江蘇儀征人。一九〇四年春，劉師培參加開封會試。臨行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呼籲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落第回鄉後回揚州，創辦師範學會和協助揚州鄉人出洋留學社，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支持學生運動；又作《黃

帝紀年論》，提出以黃帝紀年取代封建帝王紀年。一九〇四年秋，到上海與章太炎、蔡元培等一起參加反清革命，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積極為《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傳普及革命主張，並加入中國教育學會、光復會、同盟會、國學保存會等進步組織。劉師培也是一位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於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主要的作品為《中國民約精義》。

一九〇七年春，應章太炎等邀請，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結識了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與章太炎等參與發起亞洲和親會，先後發表了《普告漢人》、《悲佃篇》、《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文章。

劉師培夫婦抵達日本後，一度和章太炎關係非常密切。一開始，章太炎一直與劉師培夫婦同租一處住所，親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過兩個月，就吵得不可開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報社居住。劉、章關係的決裂，就是因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發現劉師培的妻子何震與她的表弟汪公叔關係曖昧，他看不慣，就私下告訴了劉師培。結果劉師培的母親大罵章太炎居心不良，離間夫妻關係。何震對章太炎自然懷恨在心，經常在劉師培耳邊吹枕邊風。在母親和妻子的影響下，劉師培誤解了章太炎的用心，並用行動反誣章太炎與清朝政府曖昧。他指使人偽造了章太炎與錫良電，又在上海《神州日報》偽造《炳麟啟事》，意思是說，章太炎對革命沒有信心，準備不理世事，精研佛學，出家做和尚。凡近來所進行的種種活動都係子虛烏有。為了澈底搞臭章太炎，何震還親自出馬，給吳稚暉寫了一封揭發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曾想挽救與劉師培的關係，但最終被劉師培夫婦的不斷攻擊所激怒。他在《民報》上刊登《特別廣告》，對劉師培在《神州日報》捏造的啟事予以否認，說劉師培盜走了他的一枚印章，並攻擊劉師培夫婦是清政府的偵探。劉師培夫婦採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們先是將章太炎要他們和清政府官員端方等聯繫籌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接著聘請日本人漆田增男為律師，準備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勸阻後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頓。接著，便發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調查結果顯示，是汪公叔投的毒。在這種情況下，劉師培夫婦很難在東京再呆下去了。

一九〇七年底由何震出面，劉師培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他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日本警方監視日嚴，劉師培於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回國。

《民報》積極宣傳反清革命，反對保皇，這必然要引起清朝統治者的極大恐懼和仇視。他們千方百計阻止《民報》進入國內，可《民報》還是通過各種渠道，風行國內，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都爭相閱讀《民報》。清政府絞盡腦汁也無可奈何，最後只得下令封禁《民報》的出版和發行。

一九〇七年九月四日，清政府照會日本駐華臨時代辦阿部守太郎，請他轉告日本政府，要求禁止《民報》的出版發行。日本外務省收到照會後，一度舉棋不定，只是覺得最好將雜誌負責人招來，說服其對言論加以慎重處理，較為穩妥，並沒有立即封禁《民報》。《民報》依然在大張旗鼓地宣傳反清革命的主張。十月，清政府奉天巡撫唐紹儀奉命出使美國，途經日本，直接與日本政府秘密談判，謀劃封禁《民報》。在清政府出賣一系列利益的誘惑下，再加上桂太郎新內閣上臺以後，想

對清政府表示「親善」，日本政府當局終於同意於《民報》予以封禁。

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九日，日本警察總監龜井英三郎簽署了一份由內務大臣平田東助發布的命令，指控《民報》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簡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敗壞風俗，擾亂秩序」、「激揚暗殺，破壞治安」，下令將十月十日剛出版的《民報》第二十四期全部扣押，禁止今後刊出類似文字，並勒令「停止其發賣頒布」。二十日晚，由東京牛道警察署出面，向《民報》主筆章太炎宣讀了這一命令。章太炎等人立即向日本當局提出了強硬抗議，指出《民報簡章》的六大主義早經日本內務省認可。牛道警察署對章太炎說：「此事關於外交，不關法律。」章太炎痛斥日本當局同清政府的骯髒交易，並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為把封禁《民報》的真相公諸於世，章太炎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發表了《報告〈民報〉二十四號停止情形》，籲請世界人士給予同情。同時還聘請律師向日本法庭提起訴訟。

日本政府封禁《民報》的舉動，也遭到不少中國留日學生的抗議，有十四人聯名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向日本內務部遞交抗議書。二十一日，章太炎封還禁令，表示：「吾始終不受此命令書，任君上告長官，言我反抗命令可也。」¹並致函日本內務大臣表示抗議。二十三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內務大臣予以抗議。二十六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內務大臣，言辭越來越激烈，指出對日本政府的這一無理舉動「為此者亦內疚神明，惟深秘其事，並貴國諸報章不令記載，以激外人之嘲笑」²。對此黃興、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間有分歧。黃、宋認為日本政府對《民報》的禁令，並非永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八五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八七頁。

遠禁止，如交涉得當，尚可爭取日方撤回對《本社簡章》的禁令，他們對章太炎圖一時之快、不留餘地的做法表示不滿，但是章太炎拒絕接受他們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就《民報》案開庭對章太炎進行公開審理，日語流暢的宋教仁出庭擔任被告翻譯。因「蘇報案」而名噪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法庭裁判長問章太炎：「你是《民報》編輯人兼發行人嗎？」「是」。章太炎凜然回答道。

「你多少年紀了？」

「四十一歲。」

「你可是亡命客？」

「是的。因為罵了清政府，被清政府監禁了三年，所以亡命來到你們日本。」

「你辦《民報》是什麼目的？」

「是為了給中國學者看的。」

「你在日本辦報，為什麼要給中國學者看？」

「我的文章，海內第一，只有學者可以懂得。」

「你的文章日本人可以看嗎？」

「我的文章普通中國人都看不懂，何況你們日本人！」

「那你說要顛覆異族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指世界上一般的政府嗎？」

「只說清國政府。」

說到這裡，章太炎越說越激動，他當庭質問裁判長：「擾亂治安，必有實證。我買手槍，我蓄

刺客，或可謂擾亂治安。一筆一墨，幾句文字，如何擾亂？」「我言革命，我革中國之命，非革貴國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動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國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動中國人，非鼓動日本人。於貴國之秩序何與？」傲然正氣，令對方理屈詞窮。緊接著，章太炎又大聲說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國家法律皆然，貴國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國不諱言革命，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我國聖人之言也。故我國法律，造反有罪，革命無罪，我何罪？」讓裁判長無言以對。第二天繼續開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師花井皂藏等為他做了無罪辯護。章太炎也做了三點答辯。概括起來的意思是：日本國的新聞條例，是禁止人家擾害日本的秩序，並不禁止人家擾害別國的秩序；世界各國的秩序原是不同的，怎麼能把日本的秩序強加於世界其他國家呢；假如現在的清政府是我們漢族的政府，我要去顛覆他，還勉強可以說是擾害秩序，現在這個政府只是滿洲人的政府，怎麼能說我是擾害秩序。

儘管章太炎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據理力辯，但日本政府早已決定封禁《民報》，法庭辯論只不過是做個樣子而已。十二月十二日，東京地方法院不容分辯地以《民報》違反《新聞紙案例》作出這樣的判決：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罰五十元；所刊《本社簡章》，判罰五十元；編輯及發行人、發行所未作呈報，判罰十五元，全部罰金由章太炎承擔。此案雖僅以判罰一百一十五元而告終，但導致了《民報》的休刊。

一九〇九年三月三日，法院規定的繳納罰金的期限到了，但身無分文的章太炎卻無力繳納。於

1 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是，東京警察署下令將章太炎拘留，並宣布將章太炎押往勞役場服役，以每做一天苦工抵一元罰金。幸虧他的一些學生經多方努力，湊齊了罰金，這才使章太炎免於服勞役。

正當清政府勾結日本當局封禁《民報》時，章太炎和孫中山等人圍繞《民報》的報辦方針，以及同盟會的發展等問題也逐漸產生了矛盾。

一九〇七年三月四日，在清廷公使的請求下，日本政府勸說孫中山離開日本，隨後黃興也離開日本，到香港等地籌劃武裝起義。同年七月，同盟會內部發生章太炎等攻擊孫中山事件。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孫中山離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贈送的一萬五千元，以二千元留作《民報》經費，章太炎、張繼、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義失敗和孫中山分配贈款一事發起攻擊，逼當時代理庶務幹事的劉揆一召開特別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時在香港的黃興為總理。劉揆一反對此議，他的看法是，孫中山留下二千元給《民報》，其他的用做起義軍費，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黃興「素以實行革命為務，絕不居此空虛總理之名」，而且當時正在與孫中山共謀在廣東起義，「萬一因『總理』二字而有誤會，使黨軍前途頓生阻力，非獨陷害孫、黃二公，實不啻全體黨員之自殺」。所以他要力排眾議。聲稱「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的張繼甚至在民報館與他發生了扭打。

孫中山離日時，章太炎正主持《民報》，極其困窘，因此提出，要將鈴木所贈一萬元留作報社經費。而孫中山本來就在指導思想上對章太炎辦《民報》的風格有意見，覺得章太炎不充分利用這個陣地宣傳革命，卻迂腐地談什麼國粹，實在不合適。而且，南方再舉起義更需用錢，因此只給撥了二千元。這讓章太炎對孫中山很有意見，認為他的領袖品格不堪作為楷模，同時也為同盟會趨於

腐敗而擔憂。無政府主義思想和對同盟會的成見相混合，讓章太炎甚至一度產生到印度去做和尚的想法，但苦於無費用。經過溝通，端方答應借款，章太炎就派劉師培夫婦回國接洽。但這件事最終沒有辦成。章太炎不同意由領事「按月支給」的辦法，要求先付全部費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端方不願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這一點不能為章太炎所接受。

同時，章太炎認為孫中山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工作，表白自己談國學，無非是為革命實踐奠求更深厚的理論根基。這種思想、風格及革命策略上的分歧已經影響到兩人的感情，偏偏孫中山又把日本政府贈款的事通報給章太炎等人，章太炎後來得知此事，感覺受了侮辱和愚弄，不禁怒火中燒。他提議，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由黃興接替。張繼、譚人鳳、田桐等人全都表示同意。

就在章太炎與孫中山產生分歧的關鍵時刻，劉師培又將章太炎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嚴重破壞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劇了同盟會內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動搖，與同盟會的分歧也越來越深，最終導致在一九一〇年二月，光復會從同盟會中分裂出來，在東京重立山頭。

章太炎等人在東京掀起的「倒孫風潮」，嚴重傷害了孫中山的感情，使他對同盟總部十分失望。自此，孫中山將全部心血和熱情都放到南洋方面。一九〇七年八月，孫中山積極支持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創辦《中興日報》，使之成為宣傳革命和與改良派論戰的新陣地。同時，又積極整頓南洋各地同盟會，醞釀將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一九〇八年秋，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委胡漢民為支部長，統一領導南洋各地同盟會分會。這樣，南洋支部實際上形成為一個與東京總部並峙的中心。章太炎等人為此特別憤憤不平。

和南洋相反，東京同盟會總部愈來愈渙散，《民報》的問題也愈來愈多。《民報》在歸章太炎編輯後，逐漸傾向於談國粹、說佛理。孫中山、胡漢民離日後，原主要撰稿人朱執信、汪精衛等也陸續離日，《民報》談佛理的文章更是逐漸增多。一九〇八年二月刊行的第十九號居然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緣起說》。有讀者批評其為不作「民聲」，而作「佛聲」。這種不滿當然不會是個別的。因此，報紙銷數銳減，窘迫得付不出印刷費和編輯人員的伙食費，章太炎有時只能啃幾塊麥餅。在此期間，章太炎曾多次呼籲南洋方面接濟，但前後只收到過三百元資助，這當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此後，《民報》經費更加困竭，難以支撐，章太炎又郵書五六次，並幾次去電報，請求孫中山協助解決經費問題，孫中山都未予理睬。至此，章太炎與孫中山的裂痕日深。

為了維持《民報》出版，陶成章準備親往南洋招股。對此，孫中山及東京部分革命黨人均加勸阻，理由是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多不是資本家，不會有多大效果，建議在東京另籌。但東京也並無豐厚財源，一九〇八年九月，陶成章決意南行。

陶成章（一八七八—一九一二年），中國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字煥卿，浙江會稽（今紹興）人。一九〇二年留學日本。一九〇四年一月回國，在浙江從事革命活動。同年冬，與蔡元培、龔寶銓等在上海創立光復會，成為會中重要領袖。次年夏，創辦大通師範學堂作為革命活動的重要據點。一九〇七年一月，陶成章在日本東京參加中國同盟會，任浙江分會會長。不久，同章太炎、張繼、劉師培等發起亞洲和親會。一九〇八年四月，陶擔任中國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編輯人，在宣傳中著重闡發傳統民族思想。春夏間陶回國，準備聯合江蘇等五省會黨，成立革命協會。九月，陶赴南洋從事籌款活動。並曾去緬甸擔任《光華日報》主筆。

陶成章南行的目的有二，除為《民報》募捐外，還要為籌備中的五省革命協會募集經費。到南洋後，陶成章向孫中山要求撥款三千元作為《民報》印刷費，並要求增加股款及維持費。據有關人士回憶，當時孫中山四處張羅卻籌不到款，只好拿出了手錶等物，交給陶成章變款，以救燃眉之急。陶成章因此發生誤會，與孫中山爭持不休。此外，陶成章又要求孫中山為他撥款五萬元，以便「回浙辦事」，對此，孫中山推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相助。陶成章拿著此信再去求人，但沒有一個人肯買孫中山面子。陶成章一下子明白了，一定是孫中山暗中梗阻才不成。他發下狠心，決定不求他人，自己一個人扛下來。

一無所獲的陶成章回到東京，向章太炎等人匯報了自己在外籌款的詳細情況。章太炎得知孫中山不肯相助，十分生氣，認為孫中山「忝為盟長」，對《民報》之事竟「未有半銖之助」。章太炎此後的有些言行開始變得那麼理智了。一天，章太炎氣呼呼地來到民報報館，把報館牆上掛著的孫中山像撕下來，並在上面寫道：「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他以為孫中山在香港，又把照片和批語一道寄過去，以示羞辱。¹

此外，陶成章對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的主張也深為不滿，認為這是高深莫測的方針，建議一改，但孫中山不為所動。在起義地點選擇問題上，陶成章反對孫中山重華南一帶。孫中山多次起義，多次失敗，招致章太炎不滿，再次要求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而陶成章則站在章太炎一邊。黃興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但沒有任何效果。

1 胡漢民：《南洋與中國革命》，原載張永福編：《南洋與創立民國》，轉引自熊月之：《章太炎》，第一四七頁。

在正式決裂之前，雙方還曾圍繞《民報》復刊之事發生過糾紛。《民報》被封禁時，章太炎力主前往美國或其他地方繼續出版，而這樣做，就必須籌集相當一筆經費。為此，章太炎曾急函孫中山，請求資助。此時的孫中山正為安置雲南河口起義失敗而退入越南，並為輾轉遣送到新加坡的幾百名革命軍將士的事忙得焦頭爛額，因此，根本就無力顧及《民報》復刊的事情。章太炎以為孫中山是故意置之不理，不禁大為惱火，以至當民報社同人一次集會討論《民報》復刊方法的時候，他竟負氣地「當眾辭職，並謂此後不再與聞《民報》之事」¹。

當然，章太炎只是說說氣話而已，並沒有對《民報》復刊的事不聞不問。他本指望陶成章能從南洋直接籌款成功，給他以支持。但陶成章此次赴南洋籌款，仍然沒有什麼起色。更為糟糕的是，當陶成章籌款失敗之時，東京街頭卻出現了《民報》續刊。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孫中山在未與章太炎商量的情況下，派人在日本秘密續刊《民報》，由汪精衛主編，掛名在法國巴黎發行。章太炎得知此事後更加惱火。他撰了一篇洋洋大文《偽〈民報〉檢舉狀》，廣為發布，將續刊的《民報》稱為《偽民報》，控訴孫中山的諸般「罪狀」，其中有一條，「夫孫文懷挾巨資，而用之公務者計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不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劃，其干沒可知已」²，對孫中山進行人身攻擊。後來，章太炎還和陶成章用傳單的形式，對孫中山大加非議。孫中山也不示弱，在一些報刊上，對章、陶等人進行反擊。

1 《民報》第二六期《啟事》，轉引自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第二九七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三〇三頁。

章太炎又在一些地方公開指控孫中山賣國賣友，並將黃興等人一起辱罵，說什麼「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關仁甫，非為孫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敗遁逃，乃至密告英吏，誣以大盜。其背本無恩如此」。他勸告華僑不要為孫中山、汪精衛「私有」的偽《民報》捐款。他最後說：「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為了反擊章太炎，巴黎《新世紀》、香港《中國日報》、舊金山《美洲少年報》等報刊先後披露了章太炎寫給劉師培、何震夫婦的五封信，《新世紀》斷言章太炎已被清兩江總督端方收買，「萬金出賣一革命，至為便宜」。《中國日報》更是直指章太炎「擔任解散革命黨及充常駐東京之偵探員」。黃興當時也批評章太炎「晚節不終」。但此時的章太炎根本聽不進去黃興等人的勸告。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全文刊登了陶成章等人的《同盟會七省意見書》，即《孫文罪狀》。孫中山與章太炎等人從此分道揚鑣，各立會派，各走各的路。

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六日，孫中山在舊金山改組少年學社為同盟會舊金山分會。加盟者十五人，推劉成禺、黃魂蘇、李是男任會長。孫中山將原同盟會誓詞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並改「中國同盟會會員」為「中國革命黨黨員」。並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在舊金山實施，要求南洋各埠同盟會與分會一體遵改，因遭到抵制而未能貫徹。後來，孫中山在到達美國後致函張繼稱：「所云重新組織團體，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不為同物。」又說：「同盟會及太炎至今未自認過，則弟已不承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前去兩年，兩廣、雲南之起兵，皆奉革命黨本部之名義，並未一用同盟會名義也。」

與此同時，章炳麟、陶成章也於一九一〇年二月在日本東京重新成立光復會，分任正副會長，正式與同盟會分道揚鑣，並以「反對同盟會幹部為號召」。由於基本群眾在爪哇等地，因此，光復會在南洋設行總部，代行東京本部職權，下轄各地分會，形成了所謂「以南部為根基，推東京為主幹」的局面。這樣，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就由最初的意見分歧，發展為公開分裂了。

東京講學

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學者、「有學問的革命家」。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學術成就，對近代中國政治和學術曾經產生了巨大影響。一九〇六年，在出獄東渡、抵達日本的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一些留日學生就滿懷熱望地請求章太炎能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為青年講學，做到革命、讀書兩不誤。在章太炎的主持下，一九〇六年八月，東京國學講習會成立。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沈兼士、馬幼漁、朱希祖、許壽裳等後來的學界名流，都曾前往聽講，也因此成為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在講習會的講授內容包括諸子百家、音韻訓詁和古代歷史等學問，而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主。講習會開始設在民報社，後移至東京小日向臺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門楣上直署「章氏國學講習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掛牌的國學研究團體。

東京國學講習會宣稱：「真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摺合者也。」不久，章太炎又在國學講習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國學振起社，其目的正如「廣告」中說：「本社為振起國學、發揚國光而設，間月發行講義，全年六冊，其內容共分六種：（一）諸子學；（二）文史學；（三）制度學；（四）

內典學；（五）宋明理學；（六）中國歷史。」¹

在講學課上，章太炎特別注重講「中國獨有之學」，什麼是中國獨有之學呢？正如《章太炎先生答問》中所揭示的那樣，「問：『先生講何種學？』答：『中國之小學及歷史，此二者，中國獨有之學，非共同之學』」²。在章太炎看來，在國學中與他國之學有交叉的領域，或可與他學互通有無，唯獨小學、歷史不可這樣做，因為只有這兩者，才能表明中國文化的特色所在，如果連這兩者也失去了，中國也就丟掉了自己的特色。後來，他在編著《新方言》時再次重申了這個觀點，「凡在心在物之學，體自周圍，無間方國。獨於言文歷史，其體則方，自以己國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猶多惑亂，斯可怪矣」³。

正是抱著上述目的，章太炎在講習會的課堂上，一方面傳授這些優秀的民族遺產，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一方面又利用講學的機會，憤怒譴責清朝封建統治的罪惡，直接宣傳反清革命思想。章太炎的這種講學內容，對青年一代影響頗大。正如後來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記不得了。」⁴

1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一七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九五、三四五頁。

3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九五、三四五頁。

4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二六、一二七頁。

章太炎對於教學是非常認真的。那個時候，他在經濟上還很困窘，每天一般只吃兩餐，且僅僅為素食，因此，常常覺得飢腸轆轆。但他給學生們講起課來，卻依然是精力過人，可以從早上八點一直講到中午十二點，很少休息。對於當時講學的情景，事後多年，章太炎的學生許壽裳是這樣回憶的：

每星期清晨，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席地而坐，環一小几。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覺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原，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以故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即有時隨便談天，亦復談諧間作，妙語解頤，自八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¹

在談到章太炎講學的宗旨時，許壽裳認為章太炎「講學之外，時宣微旨，深達理要，補前修之未宏，誠膚受之多妄，實足發人猛省」。

章太炎自出道以來，脾氣暴躁是出了名的，但他對學生卻是溫文爾雅，很少發火。有時，他提一些問題讓學生們自由發言，談談自己的看法，即使答錯了，他也從不責怪學生。有一次，他上課時問道「文學的定義是什麼？」話音剛一落下，魯迅就脫口說道：「先生，我認為文學和學說的不同就在於，學說是要啟發人們思考的，而文學則是要增加人們的感受的。」章太炎聽完，沉思了一

1 許壽裳：《章太炎傳》，第六〇頁。

會，就說：「你這種對文學和學說的分法，和以前的人有一定的不同，也比前人的分法要高明一點，但還是有不妥當的地方。」接著，他指出了不妥的原因。在講課之餘，章太炎還常常與學生們一起聊天，詼諧間作，妙語連珠，氣氛經常十分活躍，輕鬆的氛圍，也讓學生們緊張的神經放鬆了許多。

章太炎先生嗜煙，給學生講課時，一手拿粉筆，另一只手必拿煙卷，有時講到精彩處，拿著煙卷便往黑板上板書，常引得學生哄堂大笑。更絕的是，章太炎先生有次上課五六個弟子作陪，有專門板書的，有倒茶水的，章太炎先生國語不太好，弟子劉半農便擔任翻譯，其情其景甚是壯觀和有趣。更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先生上課的開場白：「你們來聽我上課是你們的幸運，當然也是我的幸運。」慣常的狂，大有「平生不識章太炎，訪盡名流亦枉然」之架勢，但卻絲毫不減眾人對他的敬仰。這可能是章太炎狂得有資本的緣故。

對於章太炎東京講學時對學生的溫和態度，以及上課時的詼諧之態，當年的學生周作人回憶說：

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講上（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太炎對於閩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的，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鰕鬚，笑嘻嘻地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裡哈喇菩薩。¹

1 周作人：《民報社聽講》，見許壽裳：《章太炎傳》，第一七四頁。

在講習會上，章太炎還曾以《論文學》為題作演講，聽者包括魯迅、周作人等人，之後此文以《文學論略》為題發表於《國粹學報》，稍後又收輯於《國故論衡》的《文學總略》。在這裡，章太炎首先把文學的定義擴大為一切著於竹帛之文字及法式，其原因不僅僅是基於他以治小學為本，更重要的是這種定義推翻了當時古文家狹隘的文學觀念。其次，章太炎在擴大文學範疇的同時，還把小說和雜文作為文學之兩類，這是曾國藩之後桐城古文派最為懼怕的文學主張。第三，章太炎認為文字應是先有聲後有形，文以代言，實質是主張言文一致的。章太炎的這種文學定義和文學主張，對後來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思想、文學革命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有人因此稱讚章太炎「為中國現代思想學術提供了一種抵抗簡化和趨同、守持差異和複雜的認知評判系統，對現代轉型進程中居思想強勢、世人忙於趨從而疏反思的諸多現代性理念，立足自己的根柢而多有置疑」¹。

講學使章太炎培養了一大批後來都以國學研究而馳名學界的學者。比較著名的有錢玄同、周作人、朱希祖、黃侃等，其中最讓章太炎得意的學生是黃侃。

黃侃（一八八六—一九三五年），字季剛，湖北蘄春人。原名喬馨，字梅君，後改名侃，又字季子，號量守居士。擅長音韻訓詁，兼通文學，歷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武昌高等師範、金陵大學等校教授。一生治學勤奮，以愚自處，主張「為學務精」、「宏通嚴謹」。他重視師承，但又不墨守師說，常以「刻苦為人，殷勤傳學」自警。所治文字、聲韻、訓詁之學，遠紹漢唐，近承乾嘉，多有創見，自成一家。章太炎曾以太平天國為例，諱封黃侃為「天王」。但黃侃為人輕狂，一生結

1 李振聲：《作為新文學思想資源的章太炎》，《書屋》二〇〇一年第21期。

婚九次，當時的報刊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總而言之，章太炎的東京講學，以他振興中華的強烈愛國主義熱忱宣揚國學，激發了青年們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和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他們的勇敢奮進精神，培育了我國許多文史學者和一代名家，為中國近代文化史寫下了獨放異彩的一頁。

為了講學的需要，章太炎還加緊自己的學術研究，分別撰寫了《文始》、《小學答問》、《新方言》、《國故論衡》等學術名著，系統地介紹了他在文字音韻學、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文始》是探討語言文字根源的一本著作，共九卷。在這本書中，章太炎探索了每個字的淵源，並用字的形聲加以考證。他認為，在遠古時代，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所以探求文字的起源，一定要與研究語音聯繫起來。章太炎採取了與傳統的《說文解字》不同的考證方法，他不是從字的形狀結構下手，而是從字的讀音入手，按聲韻分類，互相推較，析其本義，這樣，古書典籍中的許多字詞的本義就豁然冰釋了。這是章太炎對中國文字學的一大貢獻。

《小學答問》這部書是章太炎在回答弟子們的提問基礎上寫出來的。是據《說文解字》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以探明本字、借字流轉變化之跡，以及它們的聲義相連。小學，章太炎的解釋為語言文字學。章太炎根據《爾雅》、《詩經》、《山海經》等大批古籍，對《說文解字》中的一些字義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解決了許多難題。章太炎使「小學」真正擺脫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從而開創了一門獨立的語言文字學。

《新方言》是研究古今方言的專著。章太炎模仿漢代揚雄的《方言》而寫成此書，故名《新方

言》。《新方言》收錄方言詞語八百餘條，全書共分十一卷：釋詞、釋言、釋親屬、釋形體、釋宮、釋器、釋天、釋地、釋植物、釋動物、音表。前十卷收錄方言詞語，基本上按詞義分卷。《新方言》吸取傳統訓詁學的研究成果，根據文獻資料和實際語言相結合的原則，運用聲韻演變的規律，以「對轉」等理論來考查字音的發展，以期達到「以古語證今語，以今語通古語」的目的。經過作者的整理、考釋，古籍中的一部分難字由於跟現代的活方言互相印證，變得較易理解。章氏弟子評論說：「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論之詞，視而可識。」這正恰如其分地說明了《新方言》的粹粹所在。《新方言》卷末附嶺外三州語六十餘條，記錄惠州、嘉應州、潮州的客家話，也用《方言》、《說文解字》、《爾雅》等書引證考釋。

《國故論衡》則是一本論學文集，書名仿東漢王充《論衡》，通俗點說，就是評論這些老古董。該書是一本基本體現了章太炎的學術創見、較完整展示了章太炎的學術風貌、既精且廣的代表作。此書一九一〇年初刊於日本東京，共分三卷，上卷小學十篇，中卷文學七篇，下卷諸子學九篇，雖然各篇為獨立撰寫，但結集成冊卻條理有序，渾然一體，涵蓋了國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正如該書刊行的廣告所言，此書「解說簡明，學理湛深，誠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是一部分別從小學、文學、諸子學入手，將種種學術疑難一一剖析的整理中國古典文化的鴻篇巨制。章太炎在書中提出了「字」實際上是用同義同詞對「名」的轉述和進一步解釋，名和字存在著非常密切的寓意聯繫這一現代語言學中的重要觀點。胡適曾稱讚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是「兩千年中」與《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可以媲美的「七八部精心結構」的著作之一，足以「成一家言」。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

一九一〇年，章太炎的長女要出嫁了，女兒要嫁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龔寶銓。龔寶銓，浙江嘉興人。字未生。一九〇二年赴日本留學，參加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回國熱心暗殺活動，為光復會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當時章太炎實在是太窮了，根本無力為女兒辦個像樣的婚禮。據章太炎的長子章導回憶，當時他的大姊、三姊都跟隨父親流亡日本，生活極為艱苦。章太炎從不帶她們上飯館，只是偶爾給她們一兩個小錢買零食，遇到這種日子，她倆就高興得跳跳蹦蹦去買一點大豆之類的零食吃。有一天，父親帶了大姊、三姊、龔未生一起去飯館共進便餐。餐後，父親只攜了三姊回寓。三姊奇怪地問，為什麼大姊不一起回來？父親說，大姊隨未生去了。三姊始知這頓飯就是大姊與龔未生成親之婚宴。¹

對於章太炎東京講學期間生活的清苦，他的弟子黃侃也回憶說：「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彌厲。」²雖然條件是如此的艱辛，但章太炎依舊熱心從事革命和講學這兩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事業。

1 章導：《憶辛亥革命前後先父章太炎若干事》，見《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資料紀念專輯》，轉引自王有為：《章太炎傳》，第九八頁。
2 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第二九五頁。